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讨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题研讨综述

刘 友 红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友红(1974-), 男, 四川广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研究。

[摘 要] 李达(1890-1966)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 20 世纪的近半个世纪中, 李达通过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再创造,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特色性格。

[关键词] 李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5-0534-06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及历史进程

陶德麟教授指出, 研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并不缺乏资料, 关键是要解放思想, 打破一些流传很久的狭隘观念。例如, 把“传播”和“中国化”看成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而不承认传播本身就离不开中国化, 中国化也离不开传播; 把中国化仅仅看成党的领袖人物的工作, 而不承认它是一个有许多人以多种形式参与、由多方面的工作构成的系统工程; 等等。从新的视角看问题, 我们就会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雍涛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人提出来的, 它主要是讲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现实化和通俗化问题。但规范性的表述仍然离不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涵义,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所谓具体化,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化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所谓民族化,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的国情, 批判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所谓通俗化, 就是用广大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 广大群众所接受。

汪信砚说, “中国化”化是一个使动词, 其意为“使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 我们必须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 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这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实践相结合, 从而既“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又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实践经验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 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形式。第二,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民族化形式, 它内在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国内外不断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封建化”或“僵化”, 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误解或歪曲。但是, 这类批评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也说明, 并不是以任何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

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不可能一下子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出现了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而且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和后来广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赵凯荣教授认为,一般来说,有三种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产生过影响,按时间前后的次序先是外国传教士,再是翻译家,后才是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革命家。三种人的动机各不相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殊语境,一切都无从谈起。长期以来,传教士、翻译家的工作是不怎么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似乎马克思主义只能被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继承和发展,这不能不涉及到对“化”的内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不可能是“中国化”的。所以,把洋文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文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中国化,而且要算作最早的中国化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中当然留下了许多对译的痕迹,因此,“让洋文讲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让中文讲马克思主义”后,小的范畴、概念大到语言风格,仍然是中国语的西洋风范。当然,形式上的中国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只是“外化”,而不是“内化”。只有像黑格尔“让德语讲哲学”变成“让哲学讲德语”一样,“让中文讲马克思主义”变成“让马克思主义讲中文”才算“化”得彻底。其典型如傅雷先生所言,“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是入了“化境”的,就如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如果说在“让洋文讲马克思主义”变成“让中文讲马克思主义”方面传教士和翻译家们做了很多工作的话,那么,“让中文讲马克思主义”变成“让马克思主义讲中文”则主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贡献了。

朱传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既是有机的,又是历史的。是在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变化中的结合,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结合,而是辩证的结合。目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脱离实践、甚至提出反对与实践相结合的倾向。他们搬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命题、概念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错误,要予以批判。因此,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实质,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和核心要求,就是以当下正在实践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实践的新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没有意义的。赵凯荣说的“三种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影响”的前两种人,只能说他们对“中国化”产生过影响,不能说他们也在“中国化”,因为这两种人传播、翻译的意图和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化”,而是其他。他们与“第三种人”即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和翻译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传播和翻译的意图和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考察中国问题的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李达及其一生的著作就是如此。

青年教师赵士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也是它不断民族化的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理解,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视野。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在理论与实践中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向世界成为世界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

博士生皮家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特别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哲学,是人类总体精神的真正反映者和体现者,能够极大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论需要,特别是能够满足盼望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中国人民的理论需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得益于我国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研究和传播;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只有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且在这一奋斗中产生了对“人类总体精神”的体验和追求的人才真正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资格,也才可能“心有灵犀一点通”,准确到位地宣传好马克思主义,并使之被其他人所理解。

博士生李志认为,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以中国人的文字表达的时候,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它是德意志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历程,构成西学东渐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共产主义的描绘,对于人的处境的深刻的关注,都带来我们对于它的亲近感,所以它在中国的命运与其他的西方文化非常不同。

博士生孙玉健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来一番变化,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科学理论。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过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青年教师赵士发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表明三个发展阶段。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具体来说,“化”的内涵涉及到四个基本层面:“化”的对象、主体、方法、目标,它们分别对应着:化

什么? 谁化? 如何化? 化成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这四个方面既具有较强的历史绵延性、逻辑连续性, 又具有明显的实践差异性、理论裂变性。尤其显著的是,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及其积极意义日益重视, 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不断开展对入道、异化、文化、市场经济、女权、全球化等时代课题的哲学研究。

二、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雍涛教授认为, 一是较早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虽然是毛泽东在 1938 年明确提出来的, 但早在我党创建初期党的创始人李达早在 1923 年 5 月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论断, 已经蕴含了“按照中国国情”、“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 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二是注重从学理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纵观李达各个时期的著作, 无论是他的译著还是专著都充分体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 并力图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三是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李达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 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 从“五四”时期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到解放后批判实用主义、胡适唯心主义; 从“大跃进”时期批判“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到“文革”初期批判林彪鼓吹的“顶峰论”, 都表现出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毛泽东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黑旋风”李逵。他说, 李逵只有“两板斧”, 李达却有“三板斧”, 他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 还多了一个大智。完全可以说, 李达的一生是传播、研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生, 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

汪信砚认为,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突出地表现出如下显著特点: 一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至少有日、俄和以法国为主的欧洲三条渠道, 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集这三条渠道的特点于一身, 其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非常明显。也正因如此, 李达是最早站在资本、产业全球化的高度科学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并得出“中国革命是世界的一部分”的正确结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二是具有准确和系统性。李达精通日、英、俄等语言, 能直接研读和吸纳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经他翻译过来的都是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名著。也正因如此,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 其准确性和系统性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的屈指可数的。三是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实际需要。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有精深研究, 但他向来坚决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他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始终是为了考察和解决不同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四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 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赵凯荣教授认为, 李达是一个专门的学者, 他更多地不是从斗争需要而是从学理上全面、系统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方向的话, 那么李达等人则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方向。一直到死, 他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化方向的主要代表人物。

朱传荣教授提出, 李达毕生进行的理论研究和著述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二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1920 年和 1921 年, 李达先后在《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就是有力的说明。因此, 侯外庐先生称他“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他的许多重要著作, 如《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 都是在中国社会革命重要历史时期, 为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而作的。赵凯荣说“李达是一个专门学者, 他更多地不是从斗争需要而是从学理上全面、系统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是不符合李达的实际情况的。2000 年为纪念李达诞辰 110 周年, 我撰写了《论李达的三部著作的历史地位》一文, 就系统阐述了李达为政治斗争需要而著述的特点。

青年教师赵士发认为,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研究中, 李达的特点是从唯物史观切入, 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地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其中, 最突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博士生皮家胜认为, 正是在斗争实践与潜心钻研相互促进的过程中, 李达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凸显“人类总体精神”之伟大思想的理解, 因而在向人们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 既能够释其精要, 又能结合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来进行, 而且能够坚决地对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批判, 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纯洁性。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还在于他的通透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李达通晓四种外国语言文字, 能直接从原文中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上有较高的理论起点。李达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学知识, 这使他能够从社会最根本问题入手, 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时,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高度的自觉性。

博士生刘晓玉认为,李达毕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坚持不懈地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李达兼具著作家和翻译家一身二任的特点。博士生邓喜道认为,李达是在西方、日本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博士生李志认为,不同于前苏联模式,日本学风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支、一个研究的对象被引入的,主要限于学术研究,而没有那么直接的实用的价值。李达受日本学风影响最深,很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著作的学习与研究,因而李达严格地根据已有的经典著作进行教授,《社会学大纲》应当说体现了他的这一态度。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李达一方面不同于毛泽东之处在于他保留了作为一个理论家的相对独立性,因而而被誉为一个“真正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决非书斋式地研究纯粹哲学,而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又具有实践者的风范。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明显的斗争性、批判性、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之外,还具有极强的宣传性、教育性和革命的目的性。他在《社会学大纲》的第一版题字:“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其目的正是第四版序言所指出的“帮助我们(战士)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

三、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陶德麟教授指出,关于李达同志研究、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过去郭湛波、侯外庐、吕振羽等学者都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也多次作过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所依据的大量事实和丰富内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理解和重视。20多年前,我们武汉大学的同志编辑出版了《李达文集》四卷,为研究李达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第一手材料;同时,我本人和文集组的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一些论述李达同志贡献的论文。在那以后,学术界出版了一些论述李达贡献的著作(例如宋镜明同志、王炯华同志的著作)。但专门论述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著作还很缺乏。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总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朱传荣教授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李达虽然未有这样明确提出;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却是他最早提出来的。1923年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就作了具体的阐明。他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达明确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这里,既强调了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它的实践性,又表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意向。李达的这种观点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亮点由本体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因此,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而重视作为认识论的实践,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大重要贡献。毛泽东在读《社会学大纲》时写下的批注:“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就是有力的证明。这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

雍涛教授认为,一是李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当时党的许多人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谁要深入研究,谁就被扣上“研究系”的帽子。李达反对这种倾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的《现代社会学》(1926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并较早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和前途。他的《社会学大纲》(1936年)把自然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价值论统一起来,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凸现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准确性,明显超出了在此之前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能够读到的马列哲学原著不多,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和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著译,就成了毛泽东接受、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李达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李达本人的哲学专著《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更有直接的影响,如《大纲》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论述,给毛泽东发挥认识辩证过程的理论提供了契机;毛泽东非常赞同并发挥了《大纲》关于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的思想,等等。50年代李达还通过《〈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的“两论”思想有所纠正、补充和发展。三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树立了榜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的一项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为中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毛泽东盛赞李达的《两论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辩证法有很大的作用。他还对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庸俗化,而是在注意概念、范畴准确性、完整性基础上作深入浅出的解释。这一点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对李达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汪信砚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考察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理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具体地考察李达在不同时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和翻译工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二是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理论贡献。李达一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独到理论建树甚多,我们可以紧紧围绕李达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这两个富有特色的命题,深入分析和全面阐释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辩证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由此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

赵凯荣教授认为,李达的主要理论贡献在唯物史观上,概括地讲,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的特殊理论。首先,在 1923 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 1926 年 6 月《现代社会学》中,他早于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既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在 1929 年《中国产业革命概论》和 1941 年的《中国社会发迟滞的原因》,明确提出从生产力的决定性来考察中国发展各阶段的性质。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构成了毛泽东等人较务实、功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了某些急功近利的缺点。

青年教师赵士发认为,李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学大纲》是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经典之作。

博士生孙玉健指出,李达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广泛宣传和深入研究辩证唯物论。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他把社会比做一座“建筑物”,基础为地面,上层建筑为木材砖瓦等,而生产力就是“地内之地力”,形象地写道:“地内之地力苟有变动,地壳即不免有塌陷之虞,则建筑物之基础势必改造,因而上层建筑亦必改造。”(《李达文集》第 1 卷第 244 页)李达在哲学战线上的最后一个贡献,是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大致可分建国前与建国后两个阶段。建国前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介绍和阐述上,主要代表作是《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建国后则更多地将精力倾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主要代表作是两论《解说》,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

陶德麟教授指出,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人就更少,而且还有许多违背事实的传闻和似是而非的议论在流传(例如说李达的哲学是从苏联教科书来的,李达的哲学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哲学,李达晚年只是毛泽东哲学的注释者,等等)。这里需要指明和强调的是:(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30 年代开始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和随后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中,李达是起步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涉及的领域最广的一位理论家。(2)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最系统的(用侯外庐的话来说就是“无出其右”),对党和大批革命者的思想的影响的深刻程度也是很少有人能比的。(3)李达从 1923 年因与陈独秀的意见分歧离开党组织到 1949 年重新入党的这段时间里主要是从事文化战线的工作,但他决没有“脱离实际”,他不但在极其艰苦危险的处境下完成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而且其理论工作的内容是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他在 1926 年和 1929 年的著作中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等的分析和论证,其深刻、准确的程度是惊人的。(4)李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法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他在诸多领域中都是开拓者(中国许多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革命家对此是熟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是同其他方面的贡献融为一体的。像这样全面的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是罕见的。我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低估了(更不用说抹杀了)李达的地位,许多很关键的问题是说不清楚的。

雍涛教授指出,李达是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其影响仅次于李大钊、陈独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研究方面则无人出其右。他是中国现代哲学界的一位巨匠,其哲学理论修养非一般哲学工作者所能比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启蒙者,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

是为真理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所以,毛泽东把李达称之为“理论界的鲁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毛泽东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想,毛泽东的意思就是说,李达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主将,是在理论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最勇敢、最坚决、最热情的战士,李达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赵凯荣教授认为,历史地位必须历史地看,不管如何评价,李达的名字已经深深刻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管师出何门、成就多大,总有可以拐弯抹角往前追溯到李达的影子。对学院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李达无疑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和前辈。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化遭受空前冲击的情况下,李达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化方向更显弥足珍贵。

青年教师赵士发认为,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居于开创者的地位。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起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其影响不会随着个人生命历程的结束而终结。他将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过程,例如他所主持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在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博士生邓喜道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作为政治宣传家的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是作为学术理论家的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从前者来看,李达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先驱。从后者来看,作为现代中国最早翻译、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其地位体现于其大量著、译中,李达以其精深的外语水平和深厚的古文功底,用汉语系统而深刻地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里扎下了根。

博士生刘晓玉认为,李达的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列宁阶段走向毛泽东阶段的中介,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作了学理上的准备。他对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密切联系社会实践的学风,铸就了二十世纪的大家风范。他的学问紧扣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影响深远。

博士生孙玉健认为,李达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誉为“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

博士生刘友红认为,李达终生笃信并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勤勉发愤,笔耕不辍,自成体系。值得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大纲》引用了不少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对以后的学术研究树立了好的榜样,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活的灵魂。他的伟大人格和思想精华仍然是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社会与历史语境以及个人条件的制约,为在新世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任重而道远。

(参加这次研讨的有陶德麟教授、朱传荣教授、汪信砚教授、雍涛教授、赵凯荣教授,青年教师赵士发,以及博士生皮家胜、刘晓玉、邓喜道、李志、孙玉健、刘友红)

(责任编辑 严真)

Discussion on LI Da & Marxist Philosophy to be Chinese: Summary

LIU You-h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You-hong (1974-),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m philosophy and culture philosophy.

Abstract: LI Da(1890-1966) was one of the precursors who spread Marxism firstly in China, and of the creators of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 was also a palmary Marxist Philosopher of China. In almost a half of 20th century, through himself elucidating and creating newly upon Marxist Philosophy, LI Da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made it have Chinese own traits.

Key words: LI Da; Marxist philosophy; to be Chinese